

浅析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的“理性”概念

董君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摘要: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了“理性”的概念, 认为理性是人类的特征, 同时对比了动物的本能和人类的理智以及中西方的理性与理智, 认为理性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所在, 中国民族精神在于理性所导引的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厚两方面。

关键词: 中国文化要义; 理性; 中国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最后一位儒家”,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有自己深刻的理解, 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阐述了中国的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以及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状况。他认为“理性实为人类的特征, 同时亦是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1]

一、理性是什么

梁漱溟所提出的“理性”概念与西方哲学中的理性概念是不同的。“康德之感性指接受表象, 样式感念的能力; 知性指把握对象, 样式概念的能力; 理性指对理念的把握能力。”^[2]这里的理性概念属于认识论的范畴, 感性、知性和理性在认识的层面上不同, 所认识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但是梁漱溟所阐发的“理性”这一概念不单纯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在梁漱溟看来, “所谓理性者, 要亦不外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1]理性是人类心理的一个状态, 是人类思想的体现, 也是人类社会的感情纽带。

在“理性”概念提出前, 梁先生更常用“直觉”一词来解释中国文化: “此敏锐的直觉, 就是孔子所谓仁。”^[3]同时认为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在直觉、情感作用盛的时候, 理智就退伏; 理智起了的时候, 总是直觉、情感平下去, 所以二者很有相违的倾向。早期梁漱溟将理智排除在“仁”之外, 所讲的直觉这一概念近似于动物的本能。孔子所说“我欲仁, 斯仁至矣。”人人都有成为圣贤的潜力, 因为人人都有内在的道德能力。所以“仁”是本能, 是直觉, 是人人皆可达到的目标。但是“仁”并不是轻易便能实现的, “仁”也绝不是个简单的本能行为, 反而需要经过一个反本能的阶段, 所以在之后的文章中梁漱溟对直觉这一概念进行扬弃,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以“理性”代替“直觉”, 理性不再包含本能属性, 成为人类独有的特征。

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这是成为君子, 也是探求“仁”的一条途径。“质”是质朴, 是天然的淳朴, 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本能; “文”就是文采, 是后天的雕琢, 可以理解为理智, 本能和理智需要结合得当, 才能成为君子, 才能真正做到“仁”, 所以人在进化过程中也需要从本能衍生出理智, 进而探求理性, 这样才能

成为人。

（一）本能与理智

梁漱溟将生物生活分为三种方式：植物摄取无机质、节足动物趋向本能、脊椎动物趋向理智。“趋向本能者，即是生下来依其先天安排的方法以生活。反之，先天安排的不够，而要靠后天想办法和学习，方能生活，便是理智之路。”^[1]生物可以粗分为植物和动物两大类，植物不能跑不能跳，它们只能通过向下层泥土里吸取无机质，跟随太阳进行光合作用被动地获得生存所需要的养分，阴天便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干旱就没有水喝，它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外在条件给予它们的。动物之中，可以分为节足动物和脊椎动物，对于节足动物来说，它们只是依靠本能来生存，而脊椎动物的生活方式往往体现出一定的计划性，它们可以主动出击游走觅食其他植物或动物，不必像植物一样等待上天的恩赐，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自己的生存。这里就从本能衍生出了理智。

在梁漱溟看来，“理智只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种倾向。”^[1]理智和本能同出一源，但理智又是反本能的，所以两者的发展方向是向背的。如果在理智上发展不足，那么最终只能依靠本能来生活。趋向理智发展的脊椎动物不少，但是理智发展不够，只能依靠本能，而一切生物最大的本能便是个体生存和种族繁衍这两大问题，它们一直没有摆脱这两大问题的束缚，终日为生存和繁衍而忙碌，但人类却从这两大问题中突破了出来，所以最终“唯独人类算得完成了理智之路”，^[1]其他动物都半途而废了。

一方面，人类依靠理智生活可以从制造工具这方面看出来。“依本能为活者，其生活工具即寓于其身体，是有限的。”^[1]动物觅食、捕杀其他动物只能靠自己的尖牙利爪，它们所依赖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人类却无法只依靠自己的身体来营生。相比起老虎狮子等许多猛兽，人类的身体显然孱弱得多，如果只依靠自己的身体，那么只能成为猛兽的口粮。人类一代代地生存下去，在地球上生存繁衍，靠的就是理智。“人于身体外创造工具而使用之，是无限的”，^[1]人类从本能生活中解放出来，生产制造工具，前途完全不可限量。

除此之外，人类凭理智生活，更凭借知识以应付问题。本能产生作用时体现出一种“即知即行，行重于知”，而理智产生作用时则体现出行为之前的犹豫。“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1]例如动物饥饿时就会觅食，人类饥饿时也会找吃的，但是人类会在一次次觅食的过程中积累生活经验，通过播种和养殖的方式来获取长久的自足的食物。人类也曾经历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在森林里刀耕火种，但在一次又一次的生活实践中，人类逐渐发现了植物生长的奥秘，从此理智衍生出来，逐渐地摆脱了本能。

动物的本能具有直接性，饿了就要觅食，渴了就要找水。而人类的理智具有一定的后延性，在饥饿的情况下，甚至也可以废寝忘食地进行一些与两大本能毫无关系的事，人类向着理智前进，其生命超脱于本能。

（二）理智与理性

人是有欲望的生物，有欲望便想要实现，想要实现便需要付出一番努力，先天的安排不够，人必须靠后天想办法和学习方能生活，因此必然会走上理智之路。上文中提到，理智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种倾向。在理智的道路上，人类向前迈进，逐渐摆脱了本能的束缚，甚至可以超越本能，超越两大生存问题，做一些本能之外的自己感兴趣的事，而不是出自本能的要求。在这条理智的道路上行进，理智逐渐达到“无所为”的地步，便逐渐衍生出“无所私”的感情，这就是理性。“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1]理智和理性都存在于心思作用中，但他们的作用对象不同，例如我们做数学题，能够做出答案是理智的作用，是智力的作用，而想要做对答案的心理则是理性的作用，这样的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之心。动物的生存生活出于本能的需要，不必为谁负责也不必谈及错误，但人类却总会犯错，没有完美的人，是人都会犯错，但人有向上心，人不甘于错误，这便是人内心存在的理性，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因此，人类的特征在理性。

理智与理性是人类心思作用的两面。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类身上总存在着理性，但是东西方的理性却是不同的。梁漱溟认为“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1]理智和理性都存在于人类的心思作用，但理智是知的一面，理性是情的一面，中国人的“情”比西洋人的“情”略长一些。中国人常说“读书明理”，这里的理不是西洋的科学、物理等等知识层面的内容，而是道德，是情理，这就是中西方两个理的不同。换言之，西洋的理智是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为“物理”，研究的是自然万物的运行法则。中国的理性处理的却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为“情理”，两者在认识上是有区别的，认识的对象以及认识的方式都不同。面对物时，人需要保持客观的评价态度，面对数学、物理、化学，需要数据分析，公正客观，数据是什么我们便得出什么结论。但面对人时，我们却万万无法保持一颗客观的态度，人与人的交往总是主观的，不是冷冰冰的实验和数字，而是真真实实的感情，人与人的交往总需要依靠自身的好恶，无法完全脱离主观因素进行。因此理智和理性是两种不同的认识，理智需要摒除自身情感而后才能进行认识，理性却需要情感的加持才能明白真切。

理性之路诞生于理智，光有理智是行不通的，人做事之前会进行考量，会进行利害的选择，这是出于理智的行为。但人之所以为人，便是因为生出了“无所私”的理性之心，在理智之路中投入感情，向内自省，生发出不求功利的高尚，将“有对”的世界超进于“无对”。《论语》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面对义利的选择、欲望的诱惑，总有一些人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这是儒家所追求的理，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追求的精神所在。西方宗教认为人生来便有原罪，人是罪恶之源，因此人的一生是赎罪的过程。但儒家把人看作是和谐的，人自身是和谐的，人与人是和谐的，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也是和谐的，这样的和谐，便是清明安和之心，是理性，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

二、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在

中国民族受儒家影响巨大，儒家不同于西方宗教，认为人是和谐的，心思作用要超于官体作用之上，要人内省，诉诸理性，所以儒家所倡导的应是“理性至上主义”。正是在儒家的领导之下，中国人形成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民族精神：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

（一）向上之心强

“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1]在梁漱溟看来，这样的向上之心实为中国民族所特有的。西方社会在宗教的影响下，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总是追求人自身之外的物欲，一般总是功利思想，他们所提倡的人的个性解放不过是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个人狂欢，但中国自古至今所追求的“义”是大义，是舍小家为大家的豪气，是无所私的理性。这样的“理”，便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在。

人生向上，追求的是意欲调和。这里的“意欲”并不指向外部世界，而是人自身的内部世界。人生向上，所用力的方向也不止是向外用力奋发图强，更重要的是向内用力，寻求自身的意欲调和，用现在的我与之前的我较劲而不是自己与他人较劲。梁漱溟认为，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这种种困难与阻碍是无限的，是一直存在的，与外部持续斗争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便是向内用力，通过自我内心世界的调和，从而达到与外部世界的平衡。这样的意欲调和和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样的做法绝不是逆来顺受丧失斗志的摆烂，而是顺势而为的智慧。“遇事他便当下随感而应，这随感而应，通是对的，要于外求对，是没有的。我们人的生活便是流行之体，他自然走他最对，最妥帖最适当的路。他那遇事而感而应，就是这个变化，这个变化自要得中，自要调和，所以其所应无不恰好。”唯有做到向内自省，向内用力，意欲调和才能真正实现人生向上。

人生向上，需要立足现世。佛家倡导知空而执空，这“空”便是佛家所追求的东西，所以总教人出世，斩断红尘，斩断与现世世界连接的一切。脱离现世当下，又如何向上？基督教倡导执空而半执，认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之满足，想要踏入现世生活但又深受宗教的影响，半执有半执空，无法真正进入现世生活。文艺复兴以前的中世纪，将人自身否定得一无是处，人生来便是罪恶之源，否定了人自身的人性，文艺复兴以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追求欲望，彻底地魔化，否定了人自身的神性，所以无法做到真正的向上。儒家则“知空而执有”，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立足当下，既尊重了人的人性，又看到了人所存在的神性和魔性，将这几方面调和，务实于现世生活，“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看到而力行之，念念不离当下，此为向上心。

人生向上，要达到自觉趋善的目标。人具有创造性，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事物，这是以本能生活为目标的动物所不存在的能力，人类也因此而前途不可限量，因为创造无限，所以前途无限。中国自古便追求大同社会、小康社会，这样的社会观念、社会制度也需要依

靠人的创造。“当下一念向上，别无所取，乃为真向上。”^[1]中国人所一心追求的理想社会、理想境界都离不开一个“善”字，一念向上所追求的目标也不过一个“善”字，至于儒家也好，其他宗教也好，所追求的目标也不过是教人向上向善。梁漱溟指出，宗教道德二者，对个人，都是要人向上迁善。《大学》中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人生所追求的目标达于“至善”便臻于完善成熟。人生向上所要追求的目标，也是要达到“善”的境界。

理性精神其中之一的向上之心在于意欲调和，在于立足现世，在于自觉趋善，唯有如此向内用力才算向上，才算向上之心强。

（二）相与之情厚

向上之心，讲的是个人自身的修养奋斗，而相与之情，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人伦之情。

当然，不是只有人类才会有感情，人类之外的其他动物之间也有感情的存在，比如下跪的藏羚羊的故事。藏羚羊面对猎人眼含泪水，放弃挣扎，跪在猎人面前，是因为它的肚子里有自己的孩子，但人与人之间的情发乎理性，和其他动物不同。“高等动物在其亲子间、两性间、乃至同类间，亦颇有相关切之情可见。但那是附于本能之情绪，不出乎其生活所需要。”^[1]动物之间的情感，由本能而来，人类之间的情感，受本能影响减弱，所以至亲之间也会有卖子求荣的事情发生，非亲之间也会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存在，人类的感情可厚可薄发乎理性，与本能无关。动物之间的感情往往出于本能，不同种族不同群体之间很难产生感情，我们所了解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往往是动物由本能发出的，这样的情感当然不是理性，也不是我们所探讨的“相与之情厚”。人类的感情十分微妙，有些人为了利益变身恶魔，连最亲的人也不放过，有些人却宁肯自己贫穷也要帮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人类的感情发乎理性，无所不在。

人类的感情无所不到，但却也有发端之处，便是家庭伦理之间。“孝”是中国古代最重视的品德，“孝弟为仁之本”，一个人生来便是有家庭的，他天然地与他的父母兄弟产生联系，他成长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孝是他最开始接触到的感情，在长大之后，进而衍生出其他各类感情，也就是由伦理感情衍生出其他各类情谊关系。这样的情谊关系便是相互之间的义务关系，子女对父母的孝便要对父母负责，丈夫对妻子的情便要对妻子负责，朋友对朋友的义于是便要两肋插刀，否则必然算不上是真朋友。这种种情谊的存在便是人之间的相与之情。古时常讲“教化”，这教化所教的内容便是情义、情理。其他国家讲法律，讲科学，讲独立，讲个人。中国则讲教化，讲道德，从周孔以来，中国文化一直趋重于此。因此，与西洋相比，相与之情厚便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在。

同时，梁漱溟也指出，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厚流传到现在也有一些机械化的成分，比如西洋人流行各付各的钱，但中国人却总觉得各自付钱分得太过清楚，让人太为难情，这固然是一些弊端，但我们不可否认此两种精神植根于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理性”精神的体现，

影响深远。

三、结语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一直充满着自信,“理性”精神为全人类的特征,但尤其中华民族所特为明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便源自于理性的早启,文化的早熟。在《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中梁漱溟深刻剖析了中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以理性和理智进行区别,发前人之未发。理性精神彰显着梁漱溟先生的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对我们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2]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in Liang Shuming's *The subs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Dong 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1)

Abstract: Mr. Liang Shuming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in *The subs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believed that rationality is a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beings. He also compared animal instincts and human reason, as well as Chinese and Western reason and rationality, and believed that the spirit of rational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es in the strength of upward mobility and the love for each other that rationality induces.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es in the strong heart of upward mobility and the strong love for each other led by reason

Keywords: *The subs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Rationality; Chinese National Spirituality